

20世纪
欧美文论
丛书

考德威尔 文学论文集

【英】考德威尔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二十世紀歐美文論叢書

考德威尔文学论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
二十世纪欧美文论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英】考德威尔 著

陆建德 黄梅 薛鸿时等 译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责任校对:许洁

责任印制:宗勇

考德威尔文学论文集

Kao De Wei Er Wen Xue Lun Wen Ji

[英]考德威尔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昌市新魏路17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南昌市红星印刷厂印刷

字数 33 万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张 14.625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80579-941-5/I·766 定价:17.50 元(平)

二十世纪欧美文论丛书编辑委员会

顾问：冯至 叶水夫 王佐良 陆梅林

主编：陈 荣

副主编：郭家申 谭立德

编委：王道乾 王逢振 邓光东 白 烨

朱 虹 刘 宁 刘硕良 吕同六

吴元迈 李光鉴 李辉凡 张 羽

张 玲 张 捷 张 黎 余顺尧

陈 荣 胡其鼎 姚民有 郭宏安

郭家申 秦顺新 袁可嘉 夏 玫

夏仲翼 钱中文 黄宝生 章国锋

董衡巽 韩耀成 谭立德

(以姓氏笔划为序)

本书责任编辑：陆建德

总 序

二十世纪是战争、革命此起彼伏的时代，也是科技、经济突飞猛进的时代。时代的激变给予人们思想意识以巨大震荡，思想意识的震荡又促进了文学艺术和文学理论的千变万化。任何一个世纪没有涌现过如此变化多端的文学流派，任何一个世纪也没有出现过如此层出不穷的文学理论。

现在，二十世纪快要走完它的历程，而对于本世纪如此庞杂的文论派别，我们却所知无多。论者往往以此归咎于解放后文化上的“闭关锁国”。但平心而论，解放以前，这个领域也很少有人问津；而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介上，解放后可说是盛况空前。受冷落的主要是西方现代文论，这确是一个缺陷。它既令人闭目塞聪，难以知己知彼；又造成逆反心理，使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理论二者之间产生“新”、“旧”颠倒的看法。更何况马克思主义不应固步自封，它必须全面了解、接触到人类所创造的文化，或加以改造，或与之斗争，才能使自身得到丰富和发展。解放后数十年间，我国文艺理论之很少进展，原因之一或在于此。

诚然，与上升期资产阶级思想家、理论家富于思想性的论著不同，当代的西方文论流派有许多消极因素，如宣扬唯心主义、非理性主义、泛性论等等。而且，诸如从新批评以降的当代许多西方文学理论流派，大都是俄苏本世纪初形式主义的苗裔，一般是偏重形式而忽视内容。不过，它们也未始不能给予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以滋养。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如梅林、拉法格、普列汉诺夫和卢纳察尔斯基等，都是渊博的通才，是文学艺术的

自由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

恩格斯

ILLUSION AND
REALITY

A STUDY OF THE
SOURCES OF POETRY
BY
CHRISTOPHER CAUDWELL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46

译 序

在本世纪三十年代的欧洲,与动荡不安的社会相对应的是各种激烈碰撞的思潮。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大萧条使资本主义的弊端暴露无遗,文化界普遍对政治经济现状极为不满。面对风雨飘摇中的旧制度,有的人把人本主义、自由主义当作罪恶的渊藪,以为只有基督教才能把这“黑暗的时代”^①引向光明;有的人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首先出现于意大利但有深厚欧洲文化背景的法西斯主义当作可以疗救一切的信条;更多的知识分子预感到法西斯主义的危险性,他们相信,小修小补或费边式的改良已经无济于事,西方社会必须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希特勒在一九三三年一月以所谓“合法的革命”上台后对共产党人的残酷迫害(包括制造国会纵火案)反而大大提高了共产党的威信,共产主义的思想一时在上述最后一类人中传播。

英国三十年代的文学始终与政治密切相关。青年作家朱利安·贝尔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致《新政治家》杂志的一封信中写道,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间,剑桥大学的学生对政治不闻不问,他们平时谈论的主要话题是诗歌。而“到了一九三三年年底,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当代政治差不多成了讨论的唯一话题。在比较有才华的本科生中大部分人是共产主义者,或者说几乎是共产主义者。对文学的兴趣仍然存在,不过性质已经基本上改变了,在奥登先生的牛津派影响下,那兴趣演变为与共

^① 托·斯·艾略特《朗伯斯会议有感》(1931),载《论文选》(伦敦,1951),第387页。

产主义的联盟。大概可以不无理由地说,当今英国的共产主义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文学现象,是‘战后第二代’企图逃出‘荒原’的努力。”^① 确实,在当时这些学生和文学青年的眼中,艾略特、乔伊斯和伍尔夫等大师的作品在生活图景的映衬下显得苍白无力,无关痛痒;劳伦斯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性的扭曲固然入木三分,然而他对强力的崇拜和对意识的否定却容易使人联想到法西斯主义的某些特征。无法回避的社会现实向大家提出了表明政治立场的要求。文学不应该是一束个人的、杂色的感受,它应该堂而皇之地干预生活。苏格兰诗人休·麦克迪尔米德的《一颂列宁》(1931)开了三十年代政治诗的先河。早在二十年代末就形成的以奥登为代表的年轻诗人影响更大,他们带有左翼思想的新诗风大有统领文坛之势。贝尔在信中描述的那种转变绝对不局限于学生之间。曾主编《当代文学记事》(1925—1927)、对二十世纪英国文学批评作出重大贡献的里克沃德(Edgell Rickword, 1898—1982)就是在三十年代初成为共产主义者的,并于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八年担任《左派评论》编辑。我们在这里之所以特别提到他,不仅因为他三十年代与青年作家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有一段相同的心灵历程,还因为正是他在一九四九年整理了考德威尔的一些遗稿以《再论垂死的文化》为题出版。

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是克里斯托弗·圣约翰·斯普里格的笔名,一九〇七年十月二十日出生于英国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在伦敦附近一所天主教学校接受了初等教育后就到父亲供职的《约克群观察家报》报社当记者。一九二五年,他到伦敦一家航

① 转引自萨缪尔·海因斯《奥登那一代》(伦敦,1976),第129—130页。

空书籍出版公司任职。从此，他在航空和工程方面的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然而考德威尔的主要兴趣还是在文学方面。他在伦敦图书馆投入了大量的时间，一面如饥似渴地阅读，一面积极从事创作。在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七年之间，他先后出版了七部侦探小说和一部长篇小说，并创作了一些诗歌和短篇小说。从这些作品来看，他对文学的浓厚兴趣尚未体现出“与共产主义的联盟”。一九三四年年底标志着考德威尔短暂的一生中的分水岭：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并立即为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所吸引。此后，他又以旺盛的精力投入文学批评。他许多以惊人的速度写成的论文显示了他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原则的意向。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他已完成了他的主要论著《幻象与现实》。在写给一位曾说他作品“火候不足”的朋友的信上，考德威尔承认，他的弱点是缺少一种能使他自己身上各种需要协调一致的完整的世界观，而《幻象与现实》是形成这世界观的过程中的一块里程碑。^①一个月以后，考德威尔在伦敦东部的工人居住区加入了英国共产党。这在当时不是孤立现象，“奥登那一代”中的著名诗人塞西尔·戴—刘易斯也在一九三五年年底加入共产党，他们正好标志着贝尔所说的摆脱“荒原”阴影的“文学现象”开始和具体的社会生活相结合。

一九三六年一月，西班牙社会党、共和派、共产党和总工会组成反君主制、反天主教的人民阵线，并在国会选举中获胜，成立联合政府。这年春天，考德威尔专程到巴黎了解人民阵线执政后的西班牙政局。同年七月，西班牙的保皇党、天主教徒和法西斯长枪党在德国、意大利和葡萄牙的支持下成立最高军事管理

^① 见萨尔·海因斯为他所编辑的考德威尔所著《传奇和现实主义》（普林斯顿，1970）撰写的前言。

委员会，任命佛朗哥为首领，随之爆发了西班牙内战。当年十二月，考德威尔驾驶了他所在党支部用募集到的资金为西班牙共和国政府购买的救护车到达西班牙，并立即加入了由各国反法西斯主义的左翼人士在苏联帮助下志愿组成的国际纵队。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二日，考德威尔在保卫马德里的战斗中不幸牺牲，几个月后，他的《幻象与现实》由麦克米兰公司出版。值得一提的是，在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发展史上，一九三七年是重要的一年。除了《幻象与现实》以外，在这一年问世的还有艾立克·维斯特的《危机和批评》、拉尔夫·福克斯的《小说和人民》以及戴·刘易斯编辑的论文集《被束缚的心灵：社会主义和文化革命》。

要全面、精确地概括考德威尔的文艺思想是比较困难的，这是因为他的文学论文涉及的范围很广，提出的问题十分复杂，而他的表述却常常失之机械、粗泛。我们只想提出，他与英国以前的文学批评家的主要不同之点大概就是他处处要戳穿他所说的“资产阶级神话”，即关于超然独立的自由人的神话，依照这一神话，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人竟具有某种神奇的力量，他可以不断参与社会过程而丝毫不受其影响。考德威尔对所谓超越时空的自由人的批判当然是从马克思主义出发的。马克思在《一八五七——一八五八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应归入十八世纪鲁滨逊故事的毫无想象力的虚构……。在他们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因为，按照他们关于人类天性的看法，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① 马克思还在《资本论》第一卷揭示了鲁滨逊在孤岛上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第2卷，第86—87页。

活动具有鲜明的社会性，且看他怎样从破船上抢救出帐簿等杂物，象一个地道的英国人那样认真地记起帐来。考德威尔在论述英国近代诗歌史和小说发展时正是借助于马克思的论断来历史地看待个人这现象。根据他的分析，雄赳赳地登上历史舞台并显示出惊人力量的个人实际上是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特殊产物；文艺复兴时期的君王的绝对意志代表了新兴的资产阶级的愿望。不言而喻，对非历史的资产阶级个人观的批判与存在决定意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一致。

大家都熟悉马克思下述这段文字：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产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①

在《幻象与现实》中，考德威尔把近代英国诗歌史置于英国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发展的背景上加以考察，并分析经济活动在政治层面上的表现如何影响诗歌的艺术特点或形式。他要表明

① 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

诗歌创作并非孤立的个人的活动，它受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制约。然而要正确处理文学和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具有极大的难度。依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的精神生活、精神生产是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可是“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反过来又能帮助人们克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冲突，从根本上改变“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如果“意识形态的形式”归根结底依赖物质关系的话，它们同时对经济还有积极的反作用。不然，历史唯物主义就变成了机械决定论，而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的哲学家的任务——改变世界而不仅仅是解释世界——也成为一句空话了。考德威尔在肯定存在决定意识、社会生活受制于经济基础的同时还认识到人的主体不是随物质状况任意摆布的可怜虫。他在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或称为经济唯物主义）之间摸索出一条航道，而他的罗盘则是主客体辩证统一论。这一尝试是否成功或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当然是大有讨论余地的。

在《幻象与现实》的前言中，考德威尔开宗明义地指出，把主体和客体断然拆开使之对立是哲学上的一大谬误。他秉承了马克思对机械唯物主义的批判的基本精神，强调人的理论来自对客体的实践，在主、客体之间永远存在着生机勃勃的相互作用，其表现形式就是在自然界中的人类的活动。考德威尔似乎没有提到主客体相互作用中何者为主的问题。可以理解的是，考德威尔深深感到在他的时代，人们应该在政治斗争中采取果敢的行动，革命实践在认识和改造世界中有决定性作用。他认为科学和艺术的主要差别就在前者客观地看待主客体之间的积极关系，而后者主观地处理这关系。他在探讨诗歌的起源问题时说，诗歌起始于人类与自然的斗争，是劳动的结晶。它能够通过表现集体的

感情把原始部落的成员凝聚在一起,为生存和明天而奋斗,因而它作为社会的人的产物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一个具有高度能动性、富有生气的角色。诗歌既不是绝对理念经由人类意识发出的光芒,也不是独立于人的所谓客观世界的再现,它是一个充满了幻象、高于当今世界的世界。幻象源于现实但又能改造现实,正是诗的幻象才能促使未来世界的到来。在阶级社会中,新兴阶级顺应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它在诗歌上也反映出它在社会现实中主动积极的态度。但是随着这阶级的成熟、衰老,它慢慢意识到自己已经无法驾驭社会现实,于是,诗歌创作逐渐沦为避世者的乐园。考德威尔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首先在法国兴起的超现实主义视为资产阶级立场的最后表现:它回到了现实主义,但这种现实主义仅仅是资产阶级分子个人的无意识的世界,与外界的社会现实毫不相干。在小说领域存在着类似的现象:积极的现实主义渐次演变为僵化的自然主义,资产阶级的幻象——例如劳伦斯的空洞的、没有社会意义的个人主义(参看本文集中《D·H·劳伦斯》一文)——最终成了逃避主义者的美梦,它与现实完全脱节。可以说,考德威尔的艺术观的核心就是这幻象/现实的错综复杂的关系。通过铺展对这关系的讨论、分析,他尤其强调的,是艺术的积极社会功能。依他看来,正是艺术使人们有机会充分认识自己的潜能与自由,进而实现自己的最高价值。这样,虽然艺术主观地反映主体和客体之间富有生气的关系,但它的实践本身成为社会现实的有机组成部分。考德威尔在《幻象与现实》的最后写道,“艺术是人实现他自己的条件之一,同时也是人的现实之一。”显而易见,照考德威尔的观点,理想的艺术应该就是主客体辩证统一的形象体现。

本文集中的很多论述至今依然值得我们回味、思考。例如,

考德威尔在《幻象与现实》第六章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某一阶段,无产阶级只能接触到千篇一律但是又荒诞无稽的廉价文学作品(“热情的爱人、豪侠的牛仔和惊人的侦探”),他们的自然感情和本能渐渐趋于麻痹、贫乏。这些平庸但在市场上却行情见俏的艺术无非起了使大众适应枯燥乏味的机械生活的作用。这观点一方面反映了英国知识界在三十年代初展开的关于大众文明(相对于少数人的文化)的讨论,一方面又使我们对当前国内的“文化消费”多几分警惕。又如,在《传奇与现实主义》这部丝毫不比《幻象与现实》逊色的著作里,考德威尔分析了那种一味追求纯粹客观、试图不加入观察者价值观念的叙述法。他精辟地论述道,小说家本涅特照龚古尔的方式“超然物外,不露声色,忙着把自己的‘印象’记录下来。但是事实上,谁要是一旦成为完全的超然派,那他根本就不会有任何印象了,因为敏锐的洞察力有赖于动情的关切。”考德威尔对乔伊斯的小说《尤利西斯》的批评也出于类似的理由。他相信,写作是一门选择性极强的艺术,不能在写作过程中排除作者的组织和干预。有的人以为作者在分析、暗示小说人物有思想过程时他已经淡化或消隐到客观真实中去了,其实这描写人物内心思想的过程恰恰是作者本人的“经验的结果”。《尤利西斯》想取消作者的声音以使书中的人物具有更强的客观性,结果却与愿望相违。

考德威尔强调作家组织和筛选材料的必要性、否认超然物外的观察者的存在,并不是要把人的内心当作创作的主要或唯一来源,正如肯定主观能动性并不意味着坚持在人的心智之外不存在任何事物。他要指出的是,所谓的客观有一个被人建构的过程,因此必须把它置于社会和经济关系的背景上历史地理解。从这一点来看,考德威尔与现在一些有影响的理论家、批评家有

相通之处。近二三十年来,常见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家在论述文学阐释和历史研究中的不确定性时援引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原理”。考德威尔早在《幻象与现实》中两次引用海森堡于一九二七年发现的这条的原理来说明,人通过改变现实来认识现实,一切关于现实的知识都无可避免地含有人对现实的某种改变。他在《幻象与现实》中费了很多笔墨讨论心理学(不可否认的是,有的章节过于芜杂,甚至相当荒唐,例如关于科学家和艺术家的心理类型),目的大概是要利用这新兴的学科说明,人的感知不是消极被动的,人在知觉过程中认识的现实已经带了人的整理和理解的印记。文学艺术所反映的往往是我们对现实的理解,于是分析这现实或客观的生成过程成了研究者的新课题,考德威尔在《传奇与现实主义》里论及亨利·詹姆斯的小说创作时注意到詹姆斯作为小说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认识论问题。他认为,对于詹姆斯而言,客观世界已经不能够理所当然地接受,相反,它本身成了考察的对象。“究竟要通过谁的眼睛来观察‘情势’呢?在詹姆斯看来,那异己的晚期资产阶级文化的规范并不是什么固有的、自然的东西,而是被人们接受的、人为的东西。这种态度排除了一个从外部观察世界的‘正规’的观察者。”由于强调视角和视角变化,詹姆斯“排除了牛顿物理学和早期资产阶级小说……中一位具有绝对权威的观察者。”由此可以断言,考德威尔实际上比当今一些叙述学理论家早几十年就指出全知全能的叙述是源于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虚构。

考德威尔和本世纪的哲学家、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一样极其重视语言的功用。虽然他的诗歌观明显地受到象征主义的影

响，^①他还是意识到 首先应该用社会的语言来形成、传递个人的经验，在作者和读者之间必须有一个共同的世界。从上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一些诗人欲在象牙塔里以所谓的“文字革命”带动最深层的意识上的革命，不过这样的实践往往无视文字的社会性，于是貌似激进的姿态沦为取悦于自己的游戏。考德威尔对这类当时颇时髦的实验不抱什么同情，他了解语言既是文化遗产的载体，又是文学遗产本身，营造个人的语言体系只是自大狂的可笑表现。

强调语言的社会性也反映了考德威尔对待传统的态度：传统应该批判地继承，不能象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某些诗人那样把它彻底清算。这也是考德威尔理论的合理的一面。他在比较理性联想和自由联想时重点谈到了维护“某些共通的形式和传统”的必要。他从弗洛伊德、荣格和麦克迪等心理学家的理论得到这样的结论，即为超现实主义所推崇的自由联想实质上并不自由。“在理性联想中，形象受社会的现实经验、即对必然的意识所控制。在自由联想中，形象却受无意识的本能的铁掌所控制——因而它也就并不比蚂蚁的‘思维’更自由。人之所以自由，并不是由于意识到自己和社会的对立，而是由于通过社会而意识到自己，而这种联系本身的性质具有某些共通的形式和传统，这些就是他的自由的标记。可是超现实主义者……认为自由在于反抗那些过去自由一直赖以实现的形式。社会活动这一自由工具……便同……绝对非社会的活动处于对立”（《幻象与现实》，第六章）。考德威尔既然尊重“某些共通的形式和传统”，必然会承认任何合理的批判与创新应该建立在某种文化的继承和延续的基

^① 他把诗歌对立于散文，认为诗歌是非理性的，其“真理”难以翻译。这观点也和新批评派相似。参看《幻象与现实》第7章。